

担守卫的任务。他们告诉了我许多在莫阿克生存总部巡逻所需要的安全措施，并且要我保护这 400 个与会者不受窥探和监视。

这里有武装的雅利安人和三 K 党。以理智、爱国精神和上帝的名义，他们极力批判国债、种族解放、发给小农场主的经济援助、种族灭绝。与会者讨论了这些内容：热狗、畅销商品、突击队的小刀、圣经、山羊奶粉、癌症的自然疗法。人们大致浏览一下，美元就易主了。

我们有四个人被安排在晚上看守大门。在夜色里，我们指挥着迟到者的交通，检查他们的通行证并向里面通报。露营地安顿下来了。讨论转向传统的生存主义者的话题。首先是枪，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把枪从隐蔽的枪套里取出。“我的在车里”，我撒谎说。然后由于我们大致是没有特殊目的的陌生人，我们开始讲故事，以再次确定我们的敌人、重申我们的守则。我们围着一小堆篝火站着，听着从主会场传来的遥远的祷告和演说。我们的故事是按顺时针方向进行的。站在十二点钟位置上的人谈到经常出现在他家所在社区附近的一个公共花园里的同性恋，问在“将来”应该对他们做些什么。他的建议包括锁链、绞刑架和绑在身体上的带有长保险丝的炸药。请理解这些建议，这既不是吹牛也不意味着过分的残酷，而是一个合理的提议。我们都面临着“同性恋”问题，不是吗？社会应该是“干净”的，不是吗？我们点头表示严肃的同意。站在三点钟位置上的人思考了一阵，然后提出了一个实用的关于夜晚和练习步枪的解决方法。“好主意”，我们轻声支持。站在六点钟位置上的人说到在做完兽医手术之后，他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劳动力，我们都笑了。几辆汽车通过了大门。夜越发宁静了。现在轮到站在九点钟位置上的人，也就是我，我也讲了一个故事。

在我开始讲故事时，一个新来的人加入了我们。他听完我的想法并且赞同，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告诉我一些并非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关于计划的制定，即将采取的行动。他说他们可以用象我这样的人，并且告诉我做好参加的准备。我真诚地接受了他，其他人也是如此。他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十大通缉犯”名单上的人。

假如有不带感情地参与这种活动的研究者，我不是其中之一，而且我也不希望是。我所希望的是有一天能够忘记，忘记这些清晰的声音，我自己的话，站九点钟位置上的人所讲的故事。

他或她不再远离行动、对话，而是不可避免地被牵连到其中。伯格森所说的挑战来临了。这些社会学家被列入坎姆斯的（1942/1945）的名单中：艺术家、作家、戏剧家、和其他的文化解释者，他们发现，他们的工作对他们的定义与他们定义他们的工作一样的多。最后并且最根本的是，人种学家应该明白：在意义重大的行动中，外表和内心之间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译文选载】

男性主导情境中的女性研究者

——短期研究与长期研究

琼·内夫·格妮 (Joan Neff Gurney)

石鑫译

关于进入田野和被当地人接受的过程已有很多著述。显然，进入研究点是每个田野调查的关



键步骤；如果研究者不能进入一个环境，他或她就做不了多少研究。一旦进入，研究者就面临着双重的问題——如何保持与当地人的亲善关系，这包括根据他们的喜好做调整 and 适应，同时尽力搜集尽可能多的数据。往往对搜集数据最有利的行动（如刺探，激励，窥探）会与同当地人保持良好关系发生冲突。当田野工作者面临搜集数据与保持关系的选择时，他能否做出正确决定对研究的持续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然而正如任何有经验的田野工作者所知，在某一位置的人永远不会确信什么是正确的决定，除非事过境迁，而那对挽救数据或亲善关系（或两者）都为时已晚。

尽管进入环境和建立关系对所有的研究者都很关键，但当研究者的个人特征与被研究群体不一致时，这种努力显得尤为重要。人类学家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总是在研究自己事先没有经验过的文化，并与种族、阶级、规范、价值观以及信仰与自己不同的人打交道。然而，即使研究对象就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研究者也可能在进入环境和建立关系时遭遇未期的困难，因为他们与被观察被访问者之间在某些至关重要的方面存在差异。其中一点就是性别的差异。尽管今天有很多田野工作领域是两种性别都有的，但仍有一些领域是由一种性别统治着的。对一个主要构成是与自己相反性别的群体感兴趣的研究者，试图获得这些成员的尊重、信任和合作时，可能会遇到尴尬的情形。

在别的地方我曾注意到，很多关于田野工作的教科书把研究者假设为“任何人”，忽视了性别可能对于田野调查的影响。考虑到过去 15 年来性别对我自己研究的影响，我总结认为，这种影响因对特定田野环境的研究时间的长短而明显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这与研究者的研究是长期还是短期并因此导致的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有关。因此在讨论性别影响时，我将从对长期和短期的田野工作的区别的分析谈起。然后我将描述在这两种研究中，我的那些与性别及其对获得进入和保持亲善关系的影响有关的经历。我的大多数讨论将集中于当一个女性研究者试图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环境中进行研究时遇到的两难困境。

短期田野工作与长期田野工作

短期田野研究指在任何地方做的从几分钟到几天的研究。另一方面，长期田野工作指在一个地方呆很长时间，如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

很显然，田野工作者与当地形成的关系受他们一起度过时间的长短的影响。在短期研究中，研究者很快的进入并推出一个环境。主宾关系停留在初级或次级水平上。因为作为短期接触的结果，他们一起度过的时间全部集中在手头的问题上。这种关系没有时间发生改变或深化。田野工作者和当地人很少有时间抓住对方的个性特征。相形之下，长期研究涉及了更多，不仅有时间，还有研究者与当地人的自我。此外，随着时间他们的关系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对双方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开始时双方的怀疑和焦虑随着双方关系的发展超越礼节和细节会变的缓和或加剧。

性别对短期田野研究的影响

获得进入权在短期和长期研究中都是个问题，尽管问题的性质有所差别。在短期研究中，对被研究者的环境的进入比较短暂，因此他们对参与研究可能较少勉强，因为这在他们一方并不介入太多时间。另一方面，被访者不会很信任一个某天来到他的门口进行研究，几个小时后就离开并从此消失的陌生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女性研究者是有优势的，尤其是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中，因为女性比起男性来通常被认为是热心并较少威胁的（Weits, 1976）。当然，硬币的另一面是女性可能不象男性那样被认真对待。这就对女性研究者在短期研究中获得的资料的有效性构成威胁。



因此，男性主导环境中的女性田野工作者就象一把双刃剑。她可能更容易进入环境，但也可能会威胁到获得有效和可信数据的研究目标。

幸运的是，做短期研究的女性对克服这些潜在的劣势并非束手无策。对于不被认真对待，有很多方法可以采用。最主要的一点是强调外表呈现和可信度。例如，我的短期研究大部分在被某种专家主导的职业领域（如法官、心理医生和医院行政人员）。当进入这些环境时，我尽可能打扮的职业化。我穿着我最好的衣服；如果可能的话，是西服（当然，以一个硕士生的薪水还很难做到“穿着决定成功”）。携带各种证件也可以维持女研究者的形象。这些证件可以是身份证、名片，或当地人认识、尊重或当作权威的人所开的介绍信。作为一个做有关灾难研究的硕士生，我背了一个黑色维尼纶面的包，上面印有我代表的研究中心所在学院的徽章。我还带了一封这个中心的主任开具的正式介绍信。我几乎不需要出示这封信，大部分当地人就相信了我所说的是这个中心的合法代表的话。

做这个灾难研究的时候（70年代中期），我察觉到了性别主义的问题，并把自己当成一个女权主义者。不过，我当时还不象现在这样对性别主义的态度和信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并强化制度性性别歧视的各种微妙关节有敏感的认识。在与各种男性被访者进行的几百次深度访谈的情境中，我从未认真考虑过我的性别对我与被访者建立亲善关系和搜集数据的影响。尽管当时我是20多岁，还没结婚，我记不起曾经因为性别原因与被访者发生过问题。当然，一些男性被访者比另一些更友好、好客或愿意合作，但我从不认为他们在研究环境这对我的行为可能是受到了我的性别的严重影响。事实上，我遇到的唯一一次真正麻烦，或者说失败的访问是一位女性被访者带来的。她是一家大型罗马天主教医院的行政人员。这家医院在我研究的灾难中收治了大量伤员。不管我怎么做，怎么说，她都不允许我采访她的职员。最终我没有得到任何这部分的数据就离开了。这对我的优越感是个很大的挫败。

我另一次短期田野调查内容有对少年法庭工作人员的深度访谈，包括法官、见习职员和其他法庭职员。这项调查在大范围内进行，包括城市、乡村，遍及80年代中期的东南部的一个州。那时我30多岁，已经结婚，左手戴着一个大个的结婚戒指。我已经有了有一次长期田野调查的经历（下面将讨论到），在那次经历中我感觉到了性别可能对调查结果产生的影响。因此我对这个因素对这次少年法庭访谈的影响做了较好的协调。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发现我的性别会在研究过程中成为凸显的问题。我的很多被访者是女性，但很大比例，包括所有的法官，是男性。在与男性被访者的交往中，我从未感到任何公开的性别主义行为，也没有成为任何男性性骚扰的对象。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唯一一次访谈的困难又是一位女性被访者造成的。

简而言之，在短期研究中，我的经验是性别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变量。女性研究者如果在外表上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专业人员，她就几乎不会遇到性别带来的困难。短暂的关系还倾向于缓解女性研究者在其他场合会遇到的更严重的问题（如性别主义和性骚扰）。可能在短期研究中田野工作者的确可以是“任何人”。

性别对长期田野研究的影响

70年代后期，我决定通过对中西部的一个州的一个县检察院（prosecutors' office）的经济犯罪科的个案研究来研究白领犯罪的诉讼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尽管我当时觉得已经为这次研究做了充分准备，但现在回顾起来才意识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如何应对一个女性研究者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中会遇到的挑战是毫无准备的。

初步进入这个检察院并不十分困难。另一个硕士生已经对这个经济犯罪科正进行的一起合伙



诈骗案的主要案情做了一些调查。她的论文导师与这个科联系看他们能否再接受一个硕士生去搜集些数据。他们接受了这个提议。在初步会面介绍了这个调查的情况后，我就可以进入了。

这个经济犯罪科（ECU）是检察院的一个小部门。它有三名全职律师，一名全职调查员，一名兼职法律实习生和一名全职秘书。这为秘书是 ECU 中唯一的女性。有趣的是，我在初步建立关系时遇到的最麻烦的人又是这位女秘书。开始时，我觉得她冷淡、疏远、不友好。我认为她的否定性态度是由于我必须通过她来找想检阅的一些封缄了的卷宗。她的工作很忙，而我构成了她职责范围内的额外负担。我呆了几个星期后，她才渐渐有些热情起来。最后她接受了我，我们甚至建立和很好的关系。

我对 ECU 的田野调查大部分进展的比较顺利。我被允许可以接触所有我想看的卷宗，也可以观看检察官们一切可见的工作过程，如会议、审讯、采访等。他们对待我既礼貌又亲切，没有人对我表示敌意或公开表现出不欢迎我的态度。但当我 10 年后再次审视我的调查笔记时（的确，我保留了它们），我仍然可以象念咒语一样唤起当时所有的怀疑、忧郁和疑虑的感觉，就象一切都发生在今天¹。

我的大部分不适和焦虑来自调查的早期阶段，并集中在与主人建立亲善关系的问题上。然而有些担心一直持续，并成为整个经历中紧张感的根源。有些困难与我的男性主导的环境中的女性的身份直接相关。一个与性别问题确定无疑有关的例子是一个检查官的性骚扰。他多次试图带我到他的公寓去，借口是让我用他的电脑。他的一个办法是提供他的电脑让我做数据分析。当这个手段失败后，他又问我是否能找某个认识的人去他的公寓帮他设计电脑程序来分析一个盗用款项的案件的银行帐目。我说我不认识这方面的人，但可以帮他在学校贴个广告。他拒绝了这一提议，并且以后都再未提及。当然，这完全可能不是性骚扰的小伎俩。这位检查官可能会用同样的方法接近一位男性研究人员。尽管如此，作为女性的我有必要考虑到可能是骚扰的行为，并尽量做出礼貌而自我保护的反应。

另一个性别带来的麻烦是他们在在我面前做的与性有关的议论、暗示或讲的笑话。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房间里唯一的女性。我没法不认为这些议论或笑话是直接针对我，或至少是想对我产生某种影响的。这种议论并非天天都有，但一旦发生我就会感到非常困窘。但是我表现的无动于衷或做出临时的反应使他们看不出我的被侵犯。我觉得对这种事最好表现的消极或温和一点，而不要当成严肃的问题来对待。我希望不惜几乎一切代价避免一切可能破化与主人之间的亲善关系的事情²。此外，我对他们允许我看他们的文件和工作过程始终心怀感激，我不想因为严厉指责他们的性别主义行为而显得不知感恩。

我在研究 ECU 中的另一个关怀是“不可见”的问题。正如沃伦（1988）观察到的，在一般组织，尤其是男性主导的组织中，女性常常被放逐到一些不可见的位置上。女性一般占据低层次的职务，如文件职员、秘书和接待员。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无声无息，不妨碍任何人的进行自己的工作，但她们可以接触各种信息和组织的所有部门。

尽管不可见有沃伦所描述的种种好处，它也有不利的地方。一个人很可能由于太不可见而被人遗忘，以至于错过重要的事情。我发现这是我研究 ECU 中的一个问题。我经常事先被通知参加关于正在调查的案件的会议，但等了很久以后，检查官们却把我忘了，以至我错过了这个会议。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当我知道快要开会时，就在检查官办公室开着的门前的走廊随意走动，希望他们看见我会想起在开会时叫上我。这么做了以后，我被叫去参观的重要机会增加了，错过的机

¹我不知道是否其他田野工作者多年后回顾他们的旧笔记时也有类似这样“闪回”的经历，但我很想听听那些有这种经验的人是怎么说的。

²自那以后，我一直在想，一个人能否与在她面前说话不顾分寸的被访者建立真正的亲善关系。



会少了。

我的不可见还构成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男性调查者可能知道更多事情，或可以进入更多领域，但我不行。在我被允许参加的第一次内部会议上，ECU 的主任告诉职员说我可以到场是因为他们不会讨论任何敏感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以参加更多的会议；但我被排除在有关一起卷入国家官员的政治腐败案的会议之外。后来 ECU 的主任说这件案子的政治敏感度太高，所以即使它是一件公开的、正在进行的案件我也不能参加任何内部会议。我总在想，如果是一个男性调查者是否也会被排除在案件之外。在我的想象中，一个男性研究者可以被更好的接受为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他可以去检查官的公寓看他的电脑，还可以在工作后和男人们出去喝几杯。

当然，我可以花大量毫无建设性的时间去想象如果自己不是女性而是男性，一切会有多大不同。我并没有花过多的时间想这个问题，但关于这些问题的思索是很重要的，哪怕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让自己更好的认识性别如何影响田野工作这个问题。

结论

最后，如果我能对即将对男性主导环境进行第一次长期田野研究的年轻的女性调查者说几句，我愿意为她们提供一些建议。

首先，我想提醒她们，要认真考虑自己的外表对与被访者的互动产生的影响。如果调查在一个专业环境中进行，一定要严格遵守这个环境中的职业女性的穿着特点。第二，在进入环境前，女性研究者一定要尽可能多的了解这个环境和其中的男性女性所处的位置。这些预先的了解会增加女性在这个环境中面对时常出现的困难和障碍时的敏感度。第三，当女性研究者遇到性别主义行为或性骚扰时，应该考虑敏感并有策略的向负责部门报告。如果可能最好在私下解决问题（显然，这种办法只有在研究者的人身安全不受明显的威胁时才可行），公开惩罚或批评主人可能只会引起他们的戒备心理，使问题更难和平解决。如果私下联系不合适或起不到预期的作用，可以找这个环境中已同研究者建立了亲善关系的其他成员，向他询问如何最佳的控制局面。

最后，女性研究者必须意识到，在这一领域中，性别主义和性骚扰的确会发生。田野调查开始时就应该作好假设这些情况会发生的准备。实现就有应对这些情况的想法，当事情发生时就可以轻松处理。

【译文选载】

设法让人信服自我呈现

——关于进入田野的一些个人反思

威廉·沙菲尔 (WILLIAM B. SHAFFIR)

葛婧译 于长江校

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对田野实践进行系统化整理的努力 (Burgess, 1984A; Johnson, 1975; Schatzman&Strauss, 1973; Taylor&Bogdan, 1984)，但我依旧总是被我所从事的田野项目的唯

